

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参观并带来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精彩报告。沙龙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主持，会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彭震伟书记为汪教授颁发“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特聘顾问的荣誉聘书”。

汪光焘教授于196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获学士学位，198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路桥系，获工学硕士学位，2003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自1993年陆续任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教授。汪教授历任徐州市副市长、原国家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国家建设部总工程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长、北京市副市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现任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

报告中汪教授指出我国已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推进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意。汪教授重点分享了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研究和思考落实新型城镇化规划目标的近期主要任务，以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审视所在城市的发展定位，并分析讨论未来劳动力的流动和走向，改善城市用地结构的相关研究。最后提出了当前城乡规划的五个工作重点：认真学习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和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推动城乡规划工作改革，提出改进城市规划的编制意见；研究近期建设方案，以整合新区、新城与建成区关系为重点推进布局优化和空间效率提升，梳理已批准或正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近期规划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重视新农村建设，保护小城镇特色。



汪光焘教授长期从事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交通战略及政策等领域的技术及管理工 作，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世界能源基金会、北京市科委等一批高水平科研项目，对我国城市群发展、城市规划与管理、城市交通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未来趋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独到的睿智见解。汪教授的演讲座无虚席，精彩的演讲激起了到场各界人士的热烈讨论，在提问环节中，汪教授就“集体性建设用地的改革对城乡规划的影响”、“多规合一”等热门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参会人员交换意见。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委员会 2016 年终大会 在同济大学顺利召开顾问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委员会，2016 年终工作会议 12 月 22 日在同济大学召开，吴志强副校长，广州国规委杨堂堂总工程师，以及来自全国各城市的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了会议。会上，胡海秘书长对学委会 2016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由王俊会长主持讨论学委会 2017 年的工作计划。各位代表畅所欲言，提出新技术

应用在城市规划中的机遇与挑战。最后，吴志强副校长，中国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做总结发言，他指出学委会要意识到新技术发展的压力，需抓住三个力量：技术创新，学术研究，青年力量。注重外联合作，吸引创新企业加盟。并鼓励各位委员在新一年中保持工作激情，做出更多的创新。


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同济大学

电话: +86 21-65980048

传真: +86 21-65983414

邮箱: ciuc@ciucc.org

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文远楼 2 楼 218 室

网址: www.ciuc-cocreation.org

截止到 2017 年 1 月 6 日，中心

网站共有 153924 位访客

主编: 吴志强

责任编辑: 牛艳艳

编辑: 裴培 干靓 秦同娣 孔翎聿

责任设计: 宋一鸣

2017 / 01 / 06

CIUC NEWSLETTER

协同创新通讯

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长三角协调会新型城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

China Intelligent Urbanization Co-creation Center
Yangtze Delta Region Urban Economic Coordination Offic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专家推介 EXPERT

汪光焘教授受聘为中心特聘顾问

汪光焘，1965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获学士学位，1981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路桥系，获工学硕士学位，2003 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自 1993 年陆续任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 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教授。历任徐州市副市长、原国家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国家建设部总工程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长、北京市副市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现任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下午，汪光焘教授受邀到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做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主题演讲，并被中心聘为特聘顾问。



学术分享 Academic Highlights

大都市的水乡文明保护

戴星翼 中心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环境与工程系教授

上海前身就是一片沼泽地，长江夹着大量泥沙，在沿江一线形成沙洲，同时把内陆很多的沼泽围在里面。所谓锦绣江南，所谓江南水乡就是历朝历代的老百姓不断围垦、疏浚，形成了在水系基础上等级不一的、河流圩田交织的农业和聚落景观。过去几千年当中，以上海为核心的江南的历史就是一部水利史。这种水利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识别出不同的等级关系。每户人家周边有一条河，为了防止内涝，宅基地会比较高，宅沟或宅河就是取土筑基的结果。为了保持农田的肥沃，每年都需要从水体中把河泥捞上来做庄稼的底肥，这些就是个体层面上的水利。在邻里之间要保持排水的畅通，于是开挖浜沟，这个是第二个层面。在整个村和乡的层面，村有村河，乡有乡河。而在整个政府层面，则要维持骨干河道的畅通，包括了黄浦江和苏州河。这些，构成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水乡经营的历史。

江南水乡并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人与自然的长期互动形成的，通过这样的互动过程，形成了江南水乡的独特性：1) 精美的诗画江南、2) 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3) 柔和的社会结构、4) 富饶的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密集庞大的水乡城镇体系。

在无形的遗产方面，过去的江南水乡留给我们什么？一是柔和、合作、服从的美德，二是精致的文化特色，三、整洁的生活习俗。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就是因为水乡的自然和城镇环境造就。之所以柔和、合作和服从，是因为作为生存的基础，水利非一人之力可为，必须与他人合作。既然是合作，就需要柔和，倾听他人的意见。服从的性格则是大型水利所致。之所以追求精致，原因是水利工程本质是水乡文明的基础设施，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此大的投入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产出。在江南水乡，精耕细作的效率要高于粗放农业。水体相互连通，家庭内部、宅前屋后、田间地头的清洁是维系江南社会聚落和谐发展的重要环境保障。因此，形成了江南水乡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追求精致、精细的文化特点，这样的特点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江南精致文化的来源。

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要完整的保护水乡文明，重建江南水乡的精神层面上的传承，要非常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尽可能保持水网的完整性。这一点可能需要加以警惕，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水面面积大概占到11%—12%，而现在可能就只有6%左右了。如果再少的话，这座城市就谈不上是水网城市了。

传统社会，人和水的关系极为密切，生活的任何方面都离不开水，离不开自然的水体。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人跟水的关系开始疏远。城里人不用灌溉。排水、取水也由于工业化，更多是和水龙头打交道。河道的出行作用已经消失了。河流跟人的关系逐步转变，更多的转向了风景和休闲功能，对于一座城市的生态来说，河流可能还具有更为重要的廊道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

二要保护水质。水质应该如何保护？城市的水质保护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2000多万人的城市，方方面面都可能影响着水质。对水质造成负面作用的因素包括了：一是直接的污染排放，包括船舶的排放，二是大气的沉降、初雨径流，三是淤积、断头河、水闸造成的水流不畅的水质恶化。河水的干净，取决于水流的通畅，江南水乡特色也在于水系互通和流动。但是，水闸有很不好的作用，虽然对水利有好处，但会严重阻碍了河水的流动，也导致了水质的下降。四是区域的劣质水体，尤其是上游周边的农村水质不好，也会对城市的水体造成影响。五是垃圾，垃圾的来源跟老百姓们的日常行为有关系，水面上的垃圾，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造成的。对于上海来说，城市水体的治理需要特别重视。所有河流应该加强定期的疏浚清淤，以此代替传统社会下的定期的搞泥河措施。要梳理打通断头河，加以保证水流速度为导向的水闸调节。以收获和循环为基础，保护水体生态。同时，强化城区、郊区共同治理的机制。

三要重建人与水的关系，让人水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这次的黄浦江

两岸公共空间的贯通，有利于创造一个未来上海的最大的公共活动空间。在滨水地区，不断的举办一些活动，包括商业活动、社区活动、民间组织的活动，把滨水空间打造成常年的人水互动的空间。对于一些次级河道，如浦东张家浜、洋泾浜等非航运水道，建议试水民间承包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通过上述路径，来扩大人与水的接触界面和亲密关系。（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交流办）

思想聚焦 FOCUS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上篇） 吴志强

假如说，1976年的温哥华第一次世界人居大会是城市规划学科在联合国政治舞台上从学术被抬升为城市公共管理的一次盛典（吴志强，2005）。那么，1996年的伊斯坦布尔第二届世界人居大会上，城市规划则被绑定为政府过度干预忽视市民主体的殉葬品。而2016年基多第三届世界人居大会，则唤起了世界对城市规划学科重要性的重新认识。

有幸参加人居三大会第9政策小组参与起草《新城市议程》工作，此为契机促使自己细读人居大会的历史文献，冷静思考城市规划学科在世界城市治理中的定位。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什么是过度的公共产品定位，什么是作为学科力所不能及，什么才是学科的本质内核，什么是学科的力量，什么可以是学科的公共政策外溢。

人居三的重要性在于，它再一次重新确立了城市在世界人居环境中核心地位。人居三的重要性也在于，既

重新给予了城市规划在城市治理中的高度关注，也强调了城市规划作为学科在城市发展决策中独特而独立的学科支撑作用。对城市规划学科来说，避免城市规划学科就是城市公共政策，甚至简单地等同于城市政府至上而下的管制工具，如同在人居一世界大会上所主导的观点（联合国人居署，1976），是一门学科在热潮和冷遇之后的成熟。

1 《新城市议程》的创新点

《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是人居三世界大会的核心文件。与前两次人居大会相比，它具有以下5个创新点。

1.1 “进城权”的提出

这次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城市里居住，是人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英文原文中用“Right to the City（人居署，2016）”，我把它译成“进城权”。有人把它翻译成“城市权”是错误的，“城市权”是Right of the City，是指城市作为一个行政空间单元在国家和区域城市群中所应享受的独立自治权。而《新城市议程》所强调的是指个体的人，在全球性的城镇化过程中间不应受到种族、收入、教育、信仰等社会群落背景的歧视，公平地参与全球各国各地的城镇化历史性进程。

将参与城镇化、进入城市的权利上升到天赋人权的高度，是空前的，也是历史性的。这可能对于我们所有城市学者、城镇化研究都是陌生的，这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城市学界和国际政治上甚至成为站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价值观最顶端的一条全球性的规则。作为联合国主办的人居大会所提出的官方价值，这相对与前两届人居世界大会所提出的关键概念（人居署，2014），乃至国际城市学界、人类学研究和现代化研究，都是一次历史性的提升，相信会产生全球广泛的和

长远的价值体系建构影响。

1.2 “知行合一”的推进

过去两届的人居世界大会每次都产生两份大会文件：宏观的宣言（Declaration），以及依据宣言精神制定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此次人居三世界大会首次将两大文件合二为一，宣言条目后则必有明确行动指南，两文合一。

在文件制定过程中，每每讨论到宣言的主题思想，定有政策建议与措施（人居署，2016）。强调的是说到做到，知行合一，这是人居大会思想方法上一次重要的历史性提升，这有可能会影响改变各国城市发展政策文件的起草模式和思想方式。

1.3 城市主题的突出

前面两届人居世界大会所形成的历史文件，并没有把城市如此突出到像人居三一样的核心高度（人居署，1996）。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全球半数以上的人类已经进入了城市居住，全球的城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性阶段（人居署，2014）。

会议中人类的居住问题从多个层面和不同视角都聚焦到了城市：从对地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人类经济生产的主要活动，以及对市民社会产生的各个方面影响，城市已经聚焦了人居议题的中心位置（人居署，2016）。可以预见人居署未来的重点会继续聚焦各国的城市问题。

1.4 多级政府的互动

与第一届人居世界大会不同的是，当时更强调的是国家在人居环境上的作用，作为联合国的文件，强调的是各国政府对于人居环境的基本共识，强调的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各国政府之

间的合作。与第二届人居世界大会不同的是，人居二与人居一反其道而行之，强调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对于人居环境改善的作用，出现了对人居一强调国家政府作用的历史性反思。而人居三世界大会的主题思想强调的是多层政府之间的纵向合作和横向协同（人居署，2010；人居署，2014）。

强调各级政府，从国家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包括联合国层面；从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到乡镇自治政府在各个层面上的不同作用与责任。与前两次人居世界大会所强调的人类居住所面临问题不同，城市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关注人居的中心问题，也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家间移民和跨区域城镇化移民都集聚城市的趋势，国家政府之间、各级各地城市政府之间协同合作成为重要内容。

1.5 规划地位的重塑

从1976年的人居一到1996年的人居二，再到2016年的人居三的历史文脉中，读到城市规划作用认识的40年变迁。人居一大会上，城市规划在1970年代被历史性地提升到国家政府管理人居环境不可缺失的公共政策。人居一宣言在强调各国政府对人居环境问题的认识，积极改善各国人居环境质量要求的同时，将规划是作为国家政府的公共政策。在规划的作用在联合国文件中被提的时候，城市规划也被绑架成为政府政策。事实证明，城市规划被如此定位，是危险地忽视了其对城镇化、对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土地空间分布规律，以及对规划自身编制规律的科学内核，如此以往，对于一门缺乏内核知识体系系统架构的年轻学科，有时甚至是有害的。20年后的1996年人居二，只强调国家政府责任和作用的人居一主题思想，被大量参会的非政府组织全盘质疑（人居署，2005；人居署，2007）。城市规划在人居二世界大会上被视作各国国家政府的政策，也与至上而下的模

式一起受到质疑和批评。

实际上，现代城市规划一直保持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综合模式。公共政策在城市规划中，只是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贯穿始终的专业知识一起共同发力的其中一个向位。人居三文件在人居二的基础上大幅提升了城市规划作用的篇幅和地位，更重要的还是，更加综合地看待城市规划的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多方面作用，强调了其系统性协同上下的作用，强调的是其对城市战略和公共政策的学科支撑作用。可以清晰认识到城市规划学科回归到在人居中的的重要地位和对城市规划的创新要求。《新城市议程》的通过，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20年的走向，对城市规划自身的反省，对规划学科的内生性动力的激发，都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而，人居三基于以上五个创新点，提出了五个关键要求：

- 1) 要求关注人人参与城镇化的权利；
- 2) 要求政策行动与宣言思想的合二为一；
- 3) 要求更加聚焦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4) 要求多级政府之间上下协同广泛合作；
- 5) 要求重视城市规划重要的综合支撑作用。

新闻速递 NEWS

汪光焘教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型城镇化

国家政府责任和作用的人居一主题思想，“可持续智能城镇化”第180期可持续发展沙龙于2016年12月29日下午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文远楼三楼顺利开讲。沙龙主讲人汪光焘教授受同济大学吴志强校长邀请赴长三